

# 感动整个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

◎本报记者 **滕超**

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者，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可抵3至5个师**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家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远途。而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5年。

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这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而在中国，很多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他的归来，牵动着中国政府，也让整个中国欣喜异常。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1950年。这年6月的一天，

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此时，钱学森已经是美国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已经成为颇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国。于是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度过了14天炼狱般的生活。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将钱学森释放，但仍对其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

面对美方的蓄意阻挠，钱学森更加坚定了报国的信念。在这五年里，全家人经常搬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

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回国。”也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工程控制论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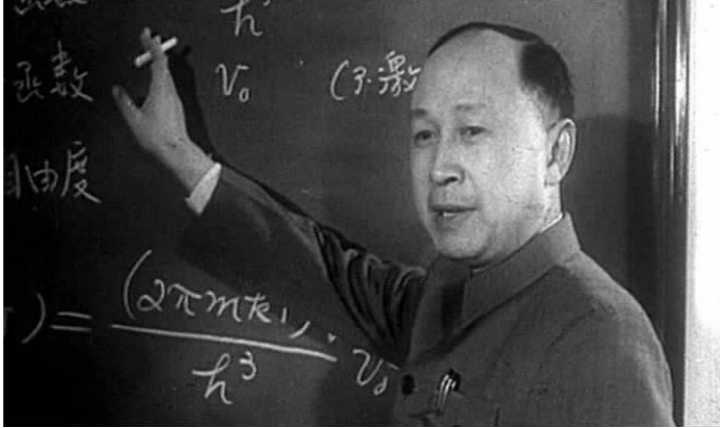
1955年9月17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没有钱学森，中国科技发展会延迟若干年**

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

回国后，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到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从参与近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到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钱学森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为中国人争气”，这是



钱学森

钱学森的追求。为国争光，则是钱学森的信念。当年，陈赓将军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当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宣布“要搞人造卫星”时，西方讥笑为“妄想一步登天”。但是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一位老科学家说：“在新中国科学界，钱学森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他，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

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延迟若干年。”

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美国准备授予钱学森院士称号，被他拒绝。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今天我国空间技术也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

**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

1974年，钱骥被任命为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为我国科学试验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研制做了大量的技术领导和组织工作。在一次研究卫星发展的讨论会上，钱骥坚定地 from 各方面论证，提出加速发展我国返回式遥感卫星，是符合国情的。这对我国返回式卫星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返回式卫星取得有价值的资料后，他又处处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的经济效益。

钱骥热爱党的事业，热爱我国空间技术研究工作，对空间事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 鲜为人知：十月革命中的中国劳工军团

◎作者 **廉荷**

俄国十月革命中，中国劳工不但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还在随后的苏俄内战中，组成一支支“中国军团”。他们跃马扬鞭，挥戈杀敌，立下赫赫战功，受到苏俄政府和列宁的嘉奖。

**列宁下令组建“中国军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一支数量不少的部队到俄奥边界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参与战地服务。

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一战时，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在中国北方大肆招工。这些人到达俄国之后，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一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惨死在战场。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旅俄华工受革命鼓舞，拿起武器，加入到十月革命中。在随后的苏俄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又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

苏俄成立后，俄国发生内战，交通受阻。中国在俄的参战部队和劳工无法撤回国内，处境艰难。经北洋政府反复交涉，苏俄同意滞留在俄国各地的中国参战人员分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 毛泽东“圈阅”并不意味着同意

“圈阅”是毛泽东生前阅文经常使用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创“圈阅”的是叶子龙。叶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关于“圈阅”的由来，叶子龙回忆道：

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发往全国。中央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着关注各地的反映。

3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

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回答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

1918年7月底，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参战人员中的一支约2000人，在张福荣（音）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南乌拉尔地区的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苏俄红军同白卫军高尔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军团正在特罗伊茨克激战。因铁路被破坏，列车无法继续前行。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穿越哈萨克斯坦草原返回中国新疆。

面对这群不速之客，苏俄红军和白军都想利用中国人为自己作战。白军命令他们进攻红军，否则予以消灭；红军指挥员瓦·康·布柳赫尔派出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站到革命者一边。中国军队被苏俄红军说服了，在张福荣的带领下加入到红军队伍中。

虽有中国军队加入，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俄红军还是顶不住对方的攻势，准备朝西北方向突围，与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的红军主力会合。这一地区河网纵横，8月5日拂晓，突围开始，白军攻势凶猛，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红军（其中有1800多名中国人）与杜托夫部血战了四天四夜，仍未突围。8月19日夜间，白军渡过托博尔河向红军所在的伊尔内克希村进攻，企图攻占该战略要点，将正在强渡济利姆河的红军后续部队拦腰斩断，各个击破。

生死存亡关头，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军人向敌人施行反冲击。他们端着刺刀，每人还背着一把马刀，迅速跃进到离敌二三百

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这支中国部队在国内属北洋军精锐之师，士兵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溃不成军，将他们赶过了托博尔河，掩护苏俄红军成功渡河。

这支包括苏俄红军和中国军队在内的8000多人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长途奔袭1600公里，于9月12日在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与红军乌拉尔第五师会合。9月14日，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特别赞扬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

9月3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听取了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出，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了嘉奖，并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合编组成“中国军团”，任命张福荣为军团长，归布柳赫尔指挥。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了成立“中国军团”的命令，托洛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军团”的军旗授予张福荣。

**列宁卫队中的华工战士**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工得到列宁的极大信任，70多名华工曾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担任保卫列宁的卫士。李富

清，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

在彼得格勒担任列宁卫士期间，每次执勤，李富清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坏。列宁为了和华工卫士进行语言交流，还抽时间向这些卫士学习“您好”、“吃饭”等日常汉语。

1923年5月，李富清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军校代表为列宁守灵。



苏俄工农红军中国团

清，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

在彼得格勒担任列宁卫士期间，每次执勤，李富清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坏。列宁为了和华工卫士进行语言交流，还抽时间向这些卫士学习“您好”、“吃饭”等日常汉语。

1923年5月，李富清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军校代表为列宁守灵。

（据《文史参考》）

## 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钱骥

◎本报记者 **郭敏**

钱骥是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领导一些青年科技骨干，把工作重点放在人造卫星应用基础研究上，对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阶段成果；开展了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

在探索火箭研制过程中，钱骥负责领导的探空火箭头部测试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多次试验成功，相继投入使用，使我国中、高层大气研究方面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同时，研制了有关电离层、电子浓度、宇宙线和磁场强度探测仪器。这些空间环境探测仪器及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研制的人造卫星打下良好的基础。

钱骥始终注视着世界上

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为了探讨我国空间技术发展途径，他提出了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先研究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1965年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东方红一号”总体负责人**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加速发展我国空间技术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钱骥进行人造卫星方案探讨，指标论证

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六年，对人造卫星的总体、结构、温度、遥测、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等方面都有一些认识与设想。无论在何种困难条件下，他始终坚持研究，坚信我国人造卫星一定会上天，这时，他不顾疲劳，日夜翻阅资料，反复思考，意识到我国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机已到。他主动协助科学家赵九章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将人造卫星早日列入空间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家钱学森也在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副总理非常重视这些建议，并批示给有关部门组织落实。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编写《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钱骥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一规划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